汪东兴三返故里

李松和　邹柳旺

苏区干部好作风，
自带干粮去办公，
日穿草鞋分田地，
夜间开会打灯笼。

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时期，这首颂扬苏区领导干部优良作风的民谣，传遍了整个赣东北大地。汪东兴同志正是在这歌声中投身家乡火热的革命斗争，后来又在歌声中离开赣北奔赴中央苏区……几十年过去了，革命胜利了。汪东兴多年工作在北京，在毛主席身边。见识不多的家乡父老，将他视为“高官”，可是汪东兴三次回到故乡的情景，不禁勾引起老区人民重新传诵着这首质朴而动人的歌谣。

1950年春夏之交，那是农历四月二十七的晚上，一位军人打扮的干部领着几个随从一行四人，风尘仆仆，踏着乡间小道，于夜幕初降时来到弋阳县清湖乡汪家村。他们人熟路通，借着农村家家户户油灯火光，一直走进汪满亮老人家的大门。他这样悄悄进村回家，谁都没想到，他，就是阔别20多年在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同志回来了。

汪东兴兴冲冲地跨进那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屋，兴奋地喊着：“爸、妈，我回来看您俩老人家啦！”那时父子之情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母子之爱，难以用语言表达。母亲拿着东兴摘下的帽，父亲摸着东兴的头，一个说："孩子，让我看看你的手，又粗又结实啦！"；一个说："东兴，你在外一切都好吧，会想家吗？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吗？"东兴说："我想念您俩老人家，这次是毛主席同意我回来看您的！"这时，汪东兴父亲手里提着一盏煤油灯，对着正厅堂上贴的毛主席像激动地说："毛主席呀，托您老人家的福，我家又团圆啦。"

这话一点不假。汪东兴同志工作在毛主席身边，肩负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，个人服从组织，想飞也飞不走啊。就在这时，毛主席批准他回家探望父母双亲一个星期的假。要他即刻启程，派了两名警卫同志和一位秘书连夜乘北京至上海快车出发了。

汪父激动地将东兴从头到脚用手摸了一遍，放心了。他满脸笑容地四周环顾："对不起，同志！父子相会，看把客人都忘了，请坐，快请坐！"。

两个警卫站在门口，东兴父子等四人坐在桌子上又谈起见面话、离别情……

汪东兴真没想到，他这次途经七饶时拜访了缪敏（方志敏遗孀）。缪敏随后即通过组织派了一个班解放军战士赶来清湖。本来，汪东兴不想惊动地方政府，更不想动用武装保卫，打算悄悄赶回家，住几天就走。可这样一来，他的行踪很快就传开了。

第二天，汪东兴家的屋内外挤满了全村父老乡亲、解放军战士，站在屋前屋后，汪东兴非常感激大家的探望，不过他还是劝阻客人扩散消息，以免来人越来越多。

这天，汪东兴家里，摆了十几张饭桌放在屋外面，汪父

把家养的一条近300斤重的猪杀了，汪母则忙着杀鸡。热热闹闹请大家吃了一天饭。

“东兴呀，你当了什么大官呀，有这么多兵来保护你？”不少乡亲好奇地问。汪东兴淡淡地答道：“我还是一名普通军人。”乡亲们见他穿着是同战士一样的普通军装，又同战友围坐在一张桌上吃饭，真看不出有半点当官的架子，他同战友有说有笑，谈笑风生。汪东兴对乡亲说：“我还是当年的东兴嘛！”大家笑了，异口同声称赞：“我们家乡的东兴回来了，当年的红十军战士又回来了……”

端午节边的天气，说变就变，接连三天的大雨，把东兴的归期拖延了。他看到父亲至今还住在曾被国民党反动派烧后的这两拼破屋里，内心十分不安，于是亲自到贵溪花了100万元钱（旧币相当于今币面值100元）买来些杉木料，要父亲把房子修一下，改善生活安度晚年。

归期到了，汪东兴给父母留下100万元生活费。这时，村政府、乡政府都派人来请东兴同志作客吃饭，他都一一谢绝了。东兴说：“我是回来探家的，并非公事，不麻烦地方政府了，更不要公家花费。”

就这样，东兴在一个风和日煦的日子里，挥手告别了家乡。经县城时，他们一行四人没有进县政府招待所，而是住私营饭店。半夜三更，饭店门口两名战士站岗，饭店老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只晓得住了一个什么大官，他也陪着值夜班。打更的老人路过饭店，询问情由，老板说：“你管不着，这里住了一位解放军大官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打更人报告了县政府。当县领导知道是汪东兴时，他们已到火车站等候上车了。弋阳县政府领导再三挽留汪东兴多住一两天，汪东兴

又婉言谢绝了。汪东兴这次探家，公私分明，不花政府一分钱，他那一个普通军人作风很快在家乡及赣东北传开了。

又是20年过去了，汪东兴父母已先后去世。1973年9月，东兴第二次回到故乡。这次回乡，他没有思想准备。当时，东兴肩负护送毛主席在杭州治眼病，大约过了十二三天，主席康复了。毛主席高兴得很，把汪东兴叫到身边，轻言细语地说："东兴，杭州离你家很近。该让你回去看看。你父母去世时，都因工作忙而离不开，没能回去，对不起他老人家。我在北京只见过他一面，他也是一个革命者，好老人家……"主席说到这里，汪东兴连忙站了起来说："谢谢主席。""好，好！今天我放你三天假，回去吧！"主席语重心长地说，"明天你就走，怎么样？"主席的话像一股暖流涌进东兴心头，他不知说什么才好，"主席，您这么关怀我，把这点小事都挂在心头。"没等东兴说下去，主席又微笑着点点头："你代我向方志敏家乡的乡亲问个好，有什么情况带回来，这也是个任务嘛！"汪东兴接上话："主席，我的任务是保护您的安全，这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。"主席踱了几个来回说："我不是好了嘛，今晚我就回北京，你也可以同时出发，不要不放心啦。"汪东兴听主席这么一说，再也不好推辞了。就这样，在送走毛主席上火车以后，汪东兴给当时在弋阳县委工作的外甥周克样同志挂了一个电话，说他有一个秘书要乘上海至南宁的火车来弋阳，要他去火车站接。

第二天，上午9点多钟，火车抵达弋阳站。周克样迎上去时，却见汪东兴和秘书、警卫人员等一齐下车了。"舅舅，你自己来，怎么不告诉一声。"克样心跳脸红手脚忙

乱。“怎么，不是通告了嘛！你如果不是我的外甥，还不告诉你呢！”当时周克样是弋阳县委书记，如果他知道是汪东兴来弋阳，还会带几个保卫人员来接他。可现在，他心里十分担心东兴的安全。汪东兴却笑着说：“克样，这次来，不住招待所，还是住自己家里好，不要惊动别人，我们自己买点菜。直接到清湖家里去。”就这样，克样自己买菜带回清湖，东兴带着秘书和警卫共3人坐一辆吉普车直接到清湖家里。

这次返乡，在家里安安心心玩了三天，没有惊动县里。在这期间，周克样陪着汪东兴到了父母双亲墓上，添上几把泥土，表达自己的哀思。

在与家乡人民的座谈中，汪东兴了解到赣东北这块红色土地上，同全国一样，起了日新月异的新变化，清湖人民筑起信江堤坝，架起了排灌电站，许多旱地变成了水田，旱涝保收了。乡亲们托汪东兴把喜讯带给毛主席，请他老人家放心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以后日子会过得更好。……汪东兴临行时，县委几位领导赶来送行，在弋阳火车站话别。大家都说克样书记保密，不应该。可是汪东兴同志说：“往来礼节从简，这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作风。你们要带头把它发扬光大……”汪东兴这次离别，在全县影响较大，群众议论这是前辈的好作风，老区人民要发扬光大。

1989年农历十月，汪东兴在家乡唯一的亲人——姐姐病故了，汪东兴为此又带着儿子汪春平返回故乡，料理姐姐的丧事。

汪老独自站在父亲遗下的一栋四拼房子边，凝视着空荡无人居住的房子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，心里默默地想，父母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这房子里，饱经沧桑，勤劳节俭，度过了晚年。保持了一个革命军属的本色，这是儿子的光荣。汪老深情地对周围的人说："我看见这平房对开玻璃的窗子，我就想起了一件往事——"

那是在1960年冬天，汪父到南昌看望汪东兴。谈话之间，汪东兴得知，还是汪第一次返回故乡时，留下100元钱，给家里修房子，同时开了一个对开窗子，当时没有配玻璃。冬天刮风，只好用纸蒙上，风吹破了又糊。就这样一连混过了十个寒冬。当时汪东兴在南昌曾任江西省副省长。当他听了父亲的话，才觉得自己对家里双亲关心得太不够了。于是汪东兴亲自带着父亲在南昌把窗上的玻璃买好，让父亲高高兴兴地把玻璃带回清湖老家。而现在，窗上玻璃还在，而汪的父母双亲却与世长辞了。

汪东兴站在窗前，沉痛地叹了一口气。乡干部对汪老说："你父母是个老同志、好同志，支持乡里工作，从未找过半点麻烦。人老百岁总会有一死，为了纪念他，我们乡里会给你把这房子修好的。"村干部也表态同意。汪东兴几个至亲侄子也接上说："这样吧，房子是要有人住的。让我们哪一个住进去，我们保证修好，管好。"汪东兴却说："谢谢你们的好意，这房子是父亲的遗产，还是用我自己工资修复。我想这房屋没有必要留作专门纪念，还是让它作出一点贡献吧！房子应交给乡政府，开办一个福利厂不是很好吗？我看这对父母是一种最好的怀念。"由于汪东兴坚持，乡村干部只好照办。大家听汪老这么一说，无不从内心敬佩汪东兴的崇高品格。

汪老第三次返乡，妥善料理亲人姐姐丧事，把父母遗下的唯一财产——房子移交给政府。后来这里办起了一个小小

的瓶盖厂，汪老父母在天之灵也会为此而感到欣慰。

此时汪老年事已高，身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，但他对家乡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仍很关心。他利用这次回乡赴丧之便，于12月4日至8日，对全县各项工作作了较全面的视察。在这期间，省委副书记刘方仁、省委副秘书长危仁晟、地委书记梁文星、地委秘书长蒋华生等同志专程到弋阳看望了汪老，并向他表示亲切的问候。

汪东兴这次回到弋阳，被安排在弋阳宾馆休息。他于4日和7日两天上午在家清湖视察，他不仅听取了县、乡干部的工作汇报，而且还深入到群众，深入到田畈，并具体走访了两个村委会，详细地了解了家乡的农业生产和乡村企业发展情况。汪老热心地建议要充分利用地方优势大力发展养殖业。汪老这次回弋阳，在县委书记方危海等同志的陪同下，还先后深入到江西有色冶炼加工厂、连胜自行车厂、海军弋阳水泥厂、旭光造纸厂、弋阳铜矿等企业参观；汪老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已逐步被开发的风景名胜圭峰；察看了县城的城建市容。他对家乡自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带来的巨变而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汪老在家乡短短的几天里，还特地召开了有邵长河、余金炉、王荣贞、董玉亭等老同志参加的座谈会，深情地回顾了人民革命斗争历史，大力弘扬革命传统。他还参观了弋阳革命烈士纪念馆，在清湖余家坞寻访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五区区委会遗址。

汪东兴同志身居高位，从不自傲，他三返故里关心家乡、热爱人民所作所为所言给赣东北人民树立了一个学习楷模。

弋阳县解放后重大政事纪略

（1949年～1965年）

罗道辉

〔剿匪反霸〕 解放初期，县境内国民党残匪同恶霸地主相互勾结，埋藏枪支弹药，待机复辟。1949年6月，县乡两级先后组织乡武装队和县独立营，在驻军部队49师145团的配合下，经过3个多月的清剿，基本肃清了全县境内的反动武装，收缴长短枪460余支，轻机枪4挺，迫击炮1门，弹药7000余发，组织流氓土匪队伍妄图称霸南乡的恶霸地主胡作宾远逃他乡，至1950年12月擒获处决。

从成立县、乡人民政府开始至土改前，全县分县、乡两级开展反霸斗争。共召开大小斗争会118次，枪决青帮头子黄景石、特务头子罗在林，叛徒颜文卿。判刑4人，关押221人。在土改中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霸斗争。分县、区、乡三级开庭审判共计195次，受审651人。说理斗争1553次，斗争敌人800余名。弋城、朱垅、洋里3个区，开庭审判121次，枪决213人，判刑144人，关押258人。

〔抗美援朝〕 1950年，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，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占我国领土。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，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人民发出“保家为国，抗美援朝”号召，弋阳县各界人士纷纷积极响应。于1951年2月筹集物资和粮款，慰问中朝部队，救济朝鲜难民，4月11日正式成

立“抗美援朝弋阳分会”，下设106个支会，5月1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，参加人数68237人，占全县总人口56.7%，6月有250名爱国青年踊跃参军参战，据载，出版《抗美援朝专刊》7期，印刷750张，举行抗美援朝展览会3次，各界人民积极捐款购买飞机大炮，据统计截至1953年2月止共捐献购买“方志敏号”飞机款9.27亿元（旧币，下同），救济款700万元，各机关、团体给志愿军写慰问信85封，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充分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朝的阴谋和滔天罪行，铲除了崇美、亲美、恐美的残余意识，人民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热潮蓬勃发展。

〔镇压反革命〕 由于剿匪反霸，抗美援朝和土改深入发展，人民思想觉悟逐渐提高，潜藏的少数反革命分子，感到四面楚歌面临着灭顶之灾，他们进行疯狂的反扑，企图颠复人民政权。有的拼凑反动党团骨干和帮派头子秘密组织反动团伙进行地下活动；有的造谣生事威吓群众；有的公开殴打干部和积极分子等等。针对这些情况，根据中央人民政府《惩治反革命条例》，我县于1950年10月至1951年11月，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，经过发动群众，检举揭发，查出特务分子62名，土匪19名，恶霸125名。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46名，反动会道门头子17名。处理结果，对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27名，土匪3名，恶霸45名，反动会道门头子7名，予以枪决。判死缓的2名，无期徒刑的2名，有期徒刑的40名交群众监督劳动的10名。1952年1月至4月，又在水上运输队开展了镇反运动，参加运动的有218只船，336人，处理结果，逮捕反革命分子3名，处决1名。同年11月又在农村开展镇反运动，直至1953年6月结束，实际上全县镇反运动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954年8月结束。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政权。

〔减租减息〕 1950年3月，成立“弋阳县土地改革委员会”，主任权屹夫，副主任彭方俊，委员11人，下设办公室，巡视、研究、宣传三个组。从3月份开始在全县九乡一镇开展减租、废债、退押、反霸运动。经过50多天工作，减租12.8万亩，占总耕地面积38%，减去租谷136.8万斤；被废债75户，废去债谷2万余担，有613户得益；被退押2户、退出稻谷65担，有9户得益；斗争恶霸122户，缴获稻谷702担，分给626户贫困户。经过减租减息，以保为单位组织农民协会114个，会员13632人。自卫队62个，队员3820人。民兵24队，队员332人。妇女会106个，会员4233人。儿童团35个，团员1352人。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。

〔土地改革〕 1950年10月，由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组建土改工作队，在弋城区水南乡进行土改试点，历时50余天，12月1日开始，全县分两期进行土地改革。第一期是1950年12月1日至1951年3月20日，在弋城、朱坞、洋里三个区，35个乡，288个村，15440户，60014人，土地面积191331亩，耕牛3962头进行土地改革；第二期有烈桥、曹溪、港口、洋潭4个区，40个乡，169个村，15.64户，59742人，土地面积164294亩，耕牛5525头，第一期参加土改的干部552名，其中，县级4名，区级17名（南下干部15名，本地干部2名），相当区级18名，一般干部293名，“千分之一”的干部220名；第二期参加土改的干部，有县级3名，区级20名，一般区干47人，乡干98人，“千分之一”的干部100人共计268人。每期土改大体分两个阶段，第一阶

段主要是召开各种会议，宣传土改政策，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连，深入发动群众，扩大地方武装，建立各种组织，划分阶级，开展斗争，没收和征收地主、富农的土地、耕牛、农具等。第二阶段主要是登记、评产和丈量田亩，然后以原耕为基础，按人口分配土地、耕牛、农具等生产资料。经过土改，贫下中农从地主、富农手里夺回水田17万亩，旱地约1.5万亩，无地和少地的农民20260户分得了土地，人平均2.84亩，从此农村土地占有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。

1951年11月23日至1953年1月7日，对全县7个区，92个乡分三批进行土改复查（查阶级，有无错划漏划的地、富阶级；查田亩，有无黑田或丈量不实的田亩；查思想，有无革命到顶松劲情况和组织不纯等现象）。经过复查，没收和征收房屋11378间，家具61964件、耕牛1488 5头，农具19311件、粮食（谷）194万余斤、金子290两、银子8754两、银圆60612块、人民币10559元，衣服20732件，布匹16616丈，其他折谷3018斤，除金、银上交国库外，其他物件都分给了当地贫下中农，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，对错划阶级得到了纠正。

〔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〕 1952年1月13日，开始在国家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“三反”运动，俗称“打老虎”，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受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盗窃国家财产、反偷工减料、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“五反”运动，亦称反“五毒”。

“三反”主要是在党、政、财、企业等11个单位进行，参加人数393人，查出有不同程度贪污的294人，占参加总人数72.2%。其中经过教育主动坦白交待的270人，占贪污总

人数91.8%。贪污总金额8621万元。（旧币，下同）其中：贪污1万至5万元的130人，5万至10万元的53人，10万至15万元的17人，15万至20万元的19人，20万至40万元的25人，40万至60万元的14人，60万至100万元的17人，100万至150万元的8人，150万至200万元的4人，200万至250万元的1人，250万至300万元的3人，300余万至400万元的1人，400余万元的1人，800万元以上的1人；浪费金额计达8300余万元，粮食局一个单位的浪费金额高达1700余万元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损失也很严重。3月12日奉令停止。

“五反”即反对工商界的“五毒”，“五毒”当中最主要的是偷税漏税。1953年1至9月，对全县579家工商业户开展五反斗争，经过学习动员，提高认识，采取自查补报，民主评议，检举揭发，重点清查，在清查中发现南货业方椿记勾结行商，私销货款1.71亿元，占其自报额109%。周源记帐外经营的营业额6091万元，占其自报额39.5%。最严重的是布业王华丰，本身以赊欠货款为名来抽资勾结行商，在上海经营梭木偷漏营业额3058万元，又拿帐内资金放债132万元，共得利息达60余万元，他又利用联购组主任职权，串通协和、刘永源、乾大新等大户偷漏营业额达25亿2千余万元，其他工商户多少不等都有偷漏现象。最后，经评议补交营业额款80亿元，税款2.7亿元。在农村主要是查补屠宰税，采取边查、边收、边入库的方法，共补交屠宰税3.5亿元。

经过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，纯洁了革命队伍，清除了腐败，打退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，对巩固人民政权，恢复国民经济起了关键性的巨大作用。

〔农业合作化〕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，就是通过合作化道路，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。1951年春，县委本着“自愿互利，典型示范”的原则，在弋城区水南乡徐章村组织起第一个季节性换工互助组，即黄加火互助组。尔后，又在花亭、上童等乡分别帮助建立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。互助组内贯彻“自愿互利，等价交换，民主管理”的原则。1951年底，全县发展季节性互助组484个，常年互助组6个；至1952年全县有季节性互助组1680个，农户3680户，常年互助组18个，农户209户，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12%。1953年9月，开始建立了陶湾乡陈木生农业生产合作社，社员12户，耕地195亩，采取耕牛、农具、土地入股，统一经营，评工计分，按比例分红（土地计酬40%，工分计酬60%），这种形式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简称“初级社”。至1954年12月，全县建立初级社198个，农户4987户，占总农户16.62%。

1955年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》公布后，全县又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，许多社员纷纷写报告，要求小社变大社，初级社升高级社，取消土地分红，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所有，采取定额计酬或小段包工的办法，实行各尽所能，按劳分配的原则，称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简称“高级社”。至1957年底，全县有高级社98个，社员25300户，占总农户85%，基本实现由小农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。

〔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〕 实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，也是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，把分散的个体手工业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。

1953年始，对全县手工业采取“自愿互利”的原则，开展互助合作运动。在弋江镇开始组建了铁器、缝纫、圆木、白铁生产互助组。1954年2月，缝纫组有7户裁缝，筹集股金，成立缝纫社。同年3月，原劳方木工厂也转为弋阳县木器制造工业生产合作社，后称1木器社。至12月铁器和篾器生产合作社也相继成立，共有社员126人，股金4478万元（旧币）。

1955年5月12日在弋江镇召开了“弋阳县手工业代表大会”，通过成立“弋阳县手工业劳动者协会”的决定，经过半年多的筹备，年底正式成立“弋阳县手工业劳动者协会”。1956年又改称手工业合作联社，从此加速了全县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，截至1957年上半年，全县组建各行各业手工业合作社26个，其中弋江镇有铁器、木器、建筑、篾器、竹器、雨伞、圆木、缝纫、烟丝、棉棕、五金、油脂等10个，社员553人；农村有手工业合作社10个，社员188人。全县手工业个体经济基本上纳入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轨道，完成了对手工业改造的任务。

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〕 1953年随着国家对农业、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，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，开始通过加工订货、批购零销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、生产小组等形式。对县城工商业493户（其中：商业290户、工业203户，从业人员1,031人，固定资金近12亿元，流动资金11亿多元）圩镇工商业292户（其中：商业108户，工业112户，从业人员374人。固定和流动资金共计6.5亿多元）进行了改造，改变了其经济性质，基本上纳入国家经济轨道。至1954年9月止，成为国

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、生产小组的有：纺织品28户、日用百货57户、其他食品业59户、木材加工64户、金属加工14户、缝纫业32户、食品加工49户、皮革、纺织、雨伞业8户，合计311户。

1955年开始实行分行业合营，尔后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，对资本家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，定股定息；对资本家本人和从业者，分工就业，评定工薪；在企业内部成立组织、选举领导。资本家不再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，仅是企业中的一员，按年领取利息。据查领利息的10户，总投资额为101618元（新币，下同），利息1578元。

据1956年12月16日城乡工商业改造后统计：

县城，工商业户总计249户，资金150323元，从业人员393人，其中：职工245人。

圩镇，工商业总计103户，资金11,517元。从业人员119人。

〔审干、肃反〕 1955年8月开始，审干与肃反交错进行。县委成立三人领导小组，下设审干办公室，配有专职干部28名，兼职干部8名，采取“严肃慎重，稳步积极，实事求是，调查研究”的方针，对全县821名干部（其中：区级干部148名，一般干部673名）进行审查。经过摸底排队，调查研究，确定审查干部722名，占全县干部总数的87.8%，其中定为审查对象的205名，占干部总数24.9%。最后已查清问题作出结论的179名，占审查对象82.9%，其中：全部结论的100名，部分结论的79名，未查清的26名。同年9月因为执行党的中心工作和开展肃反运动，审干工作暂时停止。

1956年，在开展反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基础上又在全县

939名干部中进行肃反运动，原县委三人领导小组扩大为五人领导小组，参加肃反工作的干部，专职的75名，兼职的7名，其中：县级5名，区级29名，一般干部48名；党员64名、团员12名、群众6名。肃反、审干按“不漏掉一个坏人，也不枉一个好人”、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立功折罪，立大功受奖”的方针政策，先后分四批进行。

第一批，从1956年5月15日开始，在县、区所属党、政、群、财、工矿、部队等56个单位进行，参加人数1002名，其中：干部754人，工人185人。查出肃反对象16名。

第二批，是同年第三季度至11月底，在县中、小学校、卫生机关和民主党派、工商联等22个单位进行，参加人数357人，查出肃反对象14名，调查对象86名。

第三批，是同年第四季度，在县属三个农场（农业试验站、涵潭、更新农场）进行，参加人数401人，其中：干部56名，工人345人。查出肃反对象9名，调查对象25名。至1957年2月结束。

第四批，主要是弋江镇所属的搬运站、打包组、手工业生产社、木帆船合作社、合作商店等8个单位，1470人参加，从1957年2月下旬开始，至1958年1月结束，单独成立第二办公室负责所属肃反工作，查出肃反对象64名。

至1956年9月，县机关肃反工作基本结束，接着又转入审干工作，尔后逐渐扩大到文教、卫生部门，至1959年8月，对各公社、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也开展了审干。

〔整风反右〕 1956年，在完成“三大改造”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，中央提出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地、深入地反官僚主义、反宗派主义、反主观主义的整风

运动。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，第一书记为组长，划分财贸、工交、党群、政法四条线，下设办公室，秘书、材料、边整边改、大辩论四个组，配专职干部11人。

整风的方法，主要是从上至下，党内党外，大鸣大放，边整边改。首先是县委领导班子集中整改，然后分系统整鸣放。1957年春，机关干部，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，分别应所在单位党组织的邀请，参加座谈会，响应毛泽东主席"帮助党整风"的号召，向党组织和领导人提意见。共提出意见273638条，绝大多数意见是揭露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的缺点、错误。

是年5月15日，全国停止党内整风。6月8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》的指示。全县于1957年10月12日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，至1958年2月止，先后对县各机关和工商界、地质队、中小学校等单位，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，开展更大规模的大鸣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。参加人数1306人，写大字报40344张。全县开展4个多月反右斗争的结果，共划出右派分子69名（极右4名），其中：党群系统5名，政法系统4名（极右1名），文教系统2名，工交系统2名，财贸系统7名，农林水系统2名，统战系统4名，区乡干部5名，中学教员6名（极右1名），小学教员32名（极右2名）。中右13名，有右派言论的101名。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是：劳动教养的6名，监督劳动的17名，撤销原职务另行分配工作的20名，降级降薪的7名，其他处分的2名，留校察看的4名，免予处分的3名，交县领导小组处理的10名。他们大部分被作为敌我矛盾对待，安置在国营农场劳动，少数留用在机关和学校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